

论废名诗论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①

张 鑫

(淮阴师范学院 中文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废名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北京大学西语系求学背景相去甚远。其理论较明显的倾向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其主要诗论合集《谈新诗》渗透了古典文化价值取向影响。在“启蒙”、“救亡”的思潮大背景下,废名关注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逼退及深刻影响,并向传统文明追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缘”之路。

关键词 废名;诗论;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4-0062-05

废名是京派小说作家群中最早开始创作的作家之一,其文风朴讷、冲淡,带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其作品注重情趣和境界,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印记。总的来说,他的理论著作与文学作品虽不算多产,但却独具特色。

这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与创作与他的求学背景有很大反差: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也曾因受西方文学家影响(例如创作《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以及创作《堂吉诃德》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乡土小说的英国大作家哈代)开始创作。按照一般的发展轨迹,他应像当时许多废古派人物一样,排斥或彻底放弃传统文化,转而寻求全新的西方现代表达方式。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废名都回归了本土。其文化价值取向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倾斜的,与之相对应,其文学价值取向是古典化的。其理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学贯中西的学者型作家在文化价值上的取向问题^②。废名选择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向中国古典文化追溯,且贯穿创作过程,以禅子之心娓娓道出禅宗之义。外部极具差异的文化环境,也未使废名忘记理想,仍沉湎于传统文化。相对于当时的主流环境,废名的选择是孤独而有主见的。他在“启蒙”、“救亡”的大潮中显得格格不入,但却在传统和西方之交汇中走出了自己的园地。由于未盲目摒弃传统,废名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其诗论《谈新诗》就深深地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

一、承继与开拓

《谈新诗》是废名于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文艺课程的讲义,前十二章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份讲义,写出后每章均经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刷发给学生,抗战爆发后,废名回黄梅老家避难,依据学生黄雨君保存的一份底稿,以《谈新诗》为书名,1944年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书前序文由周作人撰写。抗战胜利后,废名重回北大执教,又续编该讲义第十三至第十六章。《谈新诗》包含了废名关于中国新诗评论和研究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在书中废名开始思考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并向“温李”晚唐诗派进行追溯,意图向传统文化寻求现代派诗歌存在的依据。

废名的诗论主张明显受到了古典文学的影响。新诗革命初期面对的是如何打破强大的旧诗传统,实现诗体的大解放。胡适选择了“明白易懂”作为美学标准,并以此作为依据,认为“元白”一派是白话新诗的源头和正路。对晦涩难懂的“温李”一派,做了否定性评价。废名却不认为如此,他说:“旧诗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胡适之先生只是从两派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而说这一派是诗的正路……”^{[1] 26}与此相反,废名认为胡适所推崇的白话诗,倒或者与我们今日新散文的一派有一点儿关系。反之,胡适认为反

收稿日期 2006-09-08

作者简介 张鑫(1979—),女,山东泰安人,讲师,硕士,从事文学研究。

①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淮阴师范学院施军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②所谓价值取向,就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主张、态度,它对行为取向和评价原则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价值取向即作者在多种文化选择范围内的价值取向。下文中的文学价值取向即作者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文学价值取向间接受到文化价值取向潜移默化之影响。

动派“温李”的诗，倒似乎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李商隐的诗应是“曲子缚不住者”，因为他真有诗的内容。温庭筠的词简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词里表现的东西，确乎是以前的诗所装不下的。在生活中废名对胡适很尊敬，但在学术上，废名从不人云亦云。废名和胡适的主张是相反的，他认为：“如果要作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1]。总之，只要是我們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废名这样分析自己和胡适诗论的分歧：“胡适之先生所谓‘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论断应该是很对了，然而他的前提夹杂不清，对已往的诗文学认识得不够。他仿佛‘白话诗’是天生这么个东西的，已往的诗文学就有许多白话诗，不过随时有反动派在那里做障碍，到得现在我们才自觉了，才有意的来这么一个白话诗运动。援引已往的诗文学里的‘白话诗’做我们的新诗前例，便是对于已往的文学认识不够，我们的新诗运动真可谓之无意识的运动。”^[2]。废名不仅在思考新诗传统源头的选择问题，还重新思考新诗的定义及其与旧诗之区别。废名把自己对新诗本质问题之思考过程，称为一番“灵魂的冒险”，他在此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这个思想，并非来自严密的理论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他自身创作实践的总结。他认为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

废名把新诗内容与形式的特征概括为“新诗的内容是要诗的，文字则可以是散文的。这个思想不易被人理解。在一篇问答谈话形式的文章中，有人问到：“什么是我们的新诗的内容？”他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因为旧诗的文字，若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的，是散文的……但请随便拿一首诗来读一下……其愈为旧诗的佳作亦愈为散文的精致，这一点好像刚刚同西洋诗相反……西洋诗所表现的情思与散文的情思则显然是两种。中国诗中，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确是诗的内容，然而这种诗正是例外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所以成为诗之故，岂不在于文字么？……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

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1]。在“质胜文”和“文胜质”的关系上，废名认为新诗的内容要是诗的，文字则可以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及李商隐“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中发现了旧诗框架容纳不下的“新诗的内容”，即：“可以自由抒发的作者情绪。废名对此传统源头进行了新的探讨，引领了新的诗歌潮流，使一批现代派诗人开始热衷于温庭筠、李商隐所代表的晚唐诗词。

初期白话诗缺乏想象力。废名肯定“温李”晚唐诗派的幻觉与想象，给初期新诗带来新的角度。旧诗中想象与幻想的品格被其当作新诗的存在根据，认为这是以前诗体装不下的，这才是诗体的解放。废名认为这个解放的诗体可容得下一个立体的内容，以前的诗体则是平面的。以前的诗是竖写，温庭筠的词则是横写，以前的诗是一个镜面，温庭筠的词则是玻璃缸里的水——可以养个金鱼或者插点花，还可以把天上的云朵拉下来。废名认为李商隐的文采深藏了中国诗人所缺乏的诗人的理想。“温李”的诗，突破了旧诗的情生文、文生情局限，而能充分驰骋其幻想与想象，在他们创造的“超乎一般旧诗表现”的诗界里，极大地增强了诗的素质与内容。废名因此说，在“温词”里面所表现的东西确乎是以前的诗所装不下的，问题便在这里。废名这样解释自己的论断：“温词为向来的人们所不能理解，谁知这不被理解的原因，正是他的艺术超乎一般旧诗的表现，即是自由表现……温庭筠的词不能说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是整个的想象……”在谈温词的时候，这一点总要请大家注意，即是作者的幻想，他是画他的幻想，并不是抒情……他的美人芳草都是他自己的幻觉。”温庭筠的词都是写美人，不是作者抒情。^[1]在温李诗词中，废名努力寻找“诗的感觉”，强调这种“诗的感觉”是诗内容最重的因素。“温李”一派的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和理想，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新诗里自由成长。他把这件事叫做“文艺复兴”。

二、选择与背离

废名强调“诗的感觉”的同时，也在感觉方式及传达方式上寻求新诗的现代性走向。废名认同晚唐“温李”诗派，主要是因其“隐藏朦胧”的美学追求，符合现代派诗人的审美追求。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杜衡这样理解阐述戴望舒做诗的动机：“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的讲，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2]。废名在讨论

晚唐诗及新诗关系时,也注意诗的“古风”及其感觉方式与表现方法。废名认为六朝的诗是一种古风的脉系。这一脉系的源头,是由《诗经》开创而由楚骚完成的以“兴”的方法去感受客观、传达情绪的传统。废名在“温李”诗词的楚骚“兴”的感觉方式、表现手法中,找到了现代派诗人“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之美学需求。废名认为胡适所认为反动“温李”的诗,倒有今日新诗的趋势,李商隐的诗温庭筠的词即便不算作新诗的前例,但他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是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这与当时白话诗越白越是诗,彻底抛弃传统表达方式的潮流有相左之处。这一美学追求给新诗带来了“隐藏”与“朦胧”的特质,是与“兴”这一传统文学观念分不开的。废名如同唐人绝句一样行文的诗与小说,饱含古典的朦胧美。

基于以上认识,废名认为胡适所推崇的一些白话诗家,如朱湘等人;“他们缺少诗的感觉而他们又习惯于一种写韵文的风气”,他们缺少诗的感觉,他们有才气,所以他们的诗信笔直写,文从字顺,落到胡适先生眼下乃认为同调,说他们做的是白话诗。相反,真有诗的感觉如“温李”一派;“温词”并没有典故,李诗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从《诗经》、楚骚至“温李”的所谓“兴”,实质上是个人内心诗的感觉与客观物的契合。诗人为隐藏感情而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方式和传达方法。所谓“隐”,用“兴”的方法来表现,实际上是诗人感情与外物的融合无间,以物象藏情,以物象托情,废名也曾在《谈新诗》中讲到“刹那间的感觉”通过具体的物象表现出来,把一刹那一刹那的影子留下来,然后给人一个活动的呈现。就自然客观物来讲,这是写实;就传达的感情来讲,这是寄托,是象征,而象征是离不开朦胧与神秘的。胡适和废名对传统选择的分歧,归根到底是“隐”与“显”的分歧。胡适的新诗进化观念中没有“朦胧”和“隐藏”的美学位置。废名也有缺点,因其理论是“经过思考的偏见”。且废名过于把晚唐“温李”诗人“诗的感觉”的特殊性绝对化。他未阐述清楚,这种诗的感觉因时代的关系,与苏黄辛陆等人诗的感觉有何差异,就断言苏黄辛陆等代表的一派,有诗的才华,但“缺少诗的感觉”,习惯于写韵文的风气。因而他们的诗,乃至整个旧诗的内容,都是散文的。废名这种观念,是以一代诗人的感觉做标准,来衡量所有时代诗人的感觉,把具有独特诗质的晚唐诗词的感觉及传达方式,视为所有传统诗应具有的唯一本质。诗感觉的差异性代替了诗感觉的存在性。寻找诗的存在根据的思考变成了判定诗的内容有无的思考。

废名从“六朝文”系统中发现了西方“厌世派”的艺术精髓。从现代文学发现古典性,为五四文学溯源追根,寻求存在与发展的内在依据,努力重建它与古典文学之间原已中断的历史联系。他认为很多有成就的五四作家身上都有古典“言志”派的创造性光辉,如卞之琳、郭沫若、冰心、林庚、梁遇春等;且六朝文的生命在不断生长,古代诗人的诗之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自由联想”、“自由想象”、“乱写”、“乱作”、“言志”、“即兴”,是主观表现与个性创造的精神,也正是废名孜孜寻求的内在契合点。通过这个契合点,试图沟通古今文学。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会,并非一场平等的对话,甚至是西方工业文明逼退传统农业文明的一场战争,欲将中国古典优秀文明吞噬殆尽,西方文学将对对中国文学进行强烈撞击及彻底更新。废名更多地看重社会进步与伦理沦丧的冲突,倾向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甚至呼吁文学家从古人诗文里汲取长处,以便创作出更新而且更“中国”的新文学。这对趋于公式化及敌视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洋的文学作了一个警醒。

选择继承的同时废名也作了有限度的背离。他反对新诗对音乐过分依赖,意图割裂新诗与传统诗歌的这一链接。在《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中废名认为在新诗的途径上,只管抓住韵律的问题不放,他以为也正是张皇心理的表现。这种论断是偏激的,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用现代派的框架去框定它。目的在于寻找并肯定传统诗中与中国新诗应有的现代性特质相吻合呼应的内涵,但未考虑到中国传统诗对音律的追求与衍变,也是诗歌艺术上很大的进步与特色。同时,这种音乐成分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已与诗的内容浑然一体,并增强了诗质的表现。在此传统体式框架下,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诗歌创作主体和优秀传统诗歌,这是不可否认的。废名的这种论断,是以一种流派的美学视角代替全景性的观察,是以现代派诗人的眼光来进行衡量的,因而很难说这是对中国传统诗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科学评价。废名的思考未必全面,甚至是有偏见的。五四时期是新文化与传统大断裂的时代,文学主旋律无论从审美标准或表现手法上都引进了更新的内容。废名像其中不和谐的音符,大有“复古”之嫌,理论呈现出对古典传统文化的向往及回归。但其新颖的见解对发展中的中国新诗,发挥了一定的价值。

废名的学于西方,又遽然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除思想提升缘由之外,还与周作人的影响息息相关。周作人甚至认为,“回归之后”他的思想最是圆满^[5]。废名是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也把眼光投向过现实,希望今后社会合理、进步,其理论创作价值取向也属于

比较明亮的社会本位型价值取向^①。在周作人潜移默化影响下,他对中西文明的取舍采取了自己的一种方式。沈从文如此评价二人文风之关系:“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与周先生相似处……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是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4]

废名曾一度形成“文学即梦”的观点,也与周作人的影响密不可分。他喜欢将那“黑暗的地狱”变做“人间的天堂”,其审美情趣越来越接近周作人。在废名看来,苦难的过去只是过去,在记忆的淘筛中不复存在,时间给审美以距离和眼光,一切黑暗的现实都会幻化为美的世界、光明的天堂。废名认为只有周作人才是其他真正知音,在周作人的趣味的影响下形成其乡土文学的特点。废名自己也曾说:“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5]。杨义认为:“同样是描写乡土题材,王鲁彦受鲁迅的影响,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细密深致地写出了旧农村中沉闷悲苦的现实生活;废名受周作人的影响,带上一定程度的消极避世倾向,以倾心冲淡的文笔,写出一种返朴归真的宁静的理想境界,这种差异,就是乡土写实流派的正宗风格与旁宗情调的差异了。”^[6]周作人的这种趣味是引领废名回归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周作人认为“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喝击头,奋地一下顿然明了……如恋爱与死生之极欢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7]以禅喻文的说法也影响了废名对禅宗的追随。周作人在文学史观方面对废名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周作人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划为“言志”和“载道”两大派别、两大潮流,认为“言志”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精华,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共通的“情趣”和“气息”^[8]。周作人对文学的“新”、“旧”做了重新界定,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言志”,一是“载道”。这样,从古典的“言志派”到五四新文学,便见一条滔滔不绝,奔涌不息的“古河”,毫无断带与裂痕可言;“新文学”本质上是对古典“言志

派”的复兴,五四文学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文艺复兴”^[9]。周作人的这番话,极大地启发了废名,使他重新审视古典的“言志派”传统,从西方“厌世派”研究遽然掉头回到“六朝文”传统文化。

三、边缘之路

20世纪初东方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日趋逼退传统农业文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未能超逸这一轨道。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将社会科学纳入到科学范畴,使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传统文明的利器,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骤然尖锐。在1923年,思想界掀起一股“科学”与“玄学”论争,两派持有意见截然相反。提倡科学者竭力批判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什么是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罢了。”^[10]玄学论者则认为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方是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谓:“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1]。思想界中西文化的检讨也波及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界。作家们以生活积累为基础,耐心地体悟中西文化的优劣,作出自己的选择,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倾向。

从主流上来看,五四时期作家们与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保持着相当的一致,作家们自觉接受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从现代科学意义上关心人的生存、人的权利、人的痛苦与人的奋斗,其创作的总体精神,是要以新观念来反对传统儒、释、道三家影响下的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进而促进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进步,带有极大的启蒙色彩。而废名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中,看到了西方文明侵入中国引发的一系列失衡(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因物质的介入而日趋冷漠与自私)。废名不满于这种种失衡,转而对传统宗族制包括恬静的农业生活产生了幻想。支持他文学理念的是传统文化的3个核心,即和谐、家庭和道德。废名试图展现传统文化以及农业文明所带给人们的较之现代文明所无法比拟的安定与乐天知命感。上述3个要素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这些要素带给人民的不只是落后,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安定感与和谐,它们并非一无是处。废名看到了近现代肆行于中国土地上的

^①社会本位型价值取向向社会本位的思想(一切以改进社会现状,包括改进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各方向为思考问题的中心)成为作家创作上最根本的价值旨归。

· 简讯 ·

河海大学成立饮用水安全研究所

近日河海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成立,以加强饮用水安全研究。饮用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饮用水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活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而且目前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因水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日趋严重,使饮用水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饮用水安全保障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大水专项治理的三个重点课题之一。

河海大学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根据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以前沿科技为导向,确定了4个主要研究方向:水源水量保证与自然灾害应对,水源污染控制与防污应急,微污染源水饮用水水质安全与输配水稳定性,城乡区域供水及农村供水安全。该所目前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水循环过程中水质转化规律与安全保障技术基础研究”、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饮用水中活性炭除微污染技术的生物安全性研究”、江苏省社会发展基金项目“南京长江水源突发性污染应急水处理技术应用研究”等10多个科研项目。

河海大学成立国际河流研究所

河海大学国际河流研究所近日成立。水资源是21世纪的战略资源。随着能源危机的发展,水能资源也将成为宝贵的战略资源。由于国际河流的特殊性,随着对河流的开发,上下游国家间的争议不可避免,因此国际河流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也被世界银行列入安全保障政策之一。

河海大学作为我国唯一以水利为特色的重点高校,成立国际河流研究所是为了充分发挥学校所拥有的水文、水资源、环境、地理、社会、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加强对国际河流问题及水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该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国际河流流域自然地理与水文地理特征,国际河流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分布特征及变化,国际河流开发利用现状及生态问题,国际河流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河流冲突危机及危机管理,国际水域保护的国家间协议及共同法规研究等。

(本刊编辑部供稿)

畸形的工业文明^①,且中国传统的宗族制社会出现了种种失衡,原先有着家族温情的社会秩序被贪欲所打乱,人民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消极影响下抛弃了必要的道德。这种种有害于社会发展的失衡现象使作家感到失望。废名无力改变这种现实,只有带着淡淡的忧伤,退回到想象中的理想美好传统中去。

废名的文学主张在现代文学史中却是边缘化的。其思想曲高和寡,追求诉诸理念。正如钱理群所说的“这是一个现代人创造的现代神话,善良天真的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够结束探索‘混乱’,找到一个毫无偏颇的历史的‘合题’,即所谓各种思想、各条道路的‘结合’,一劳永逸地给一切人类之谜以一个完满的‘解答’,从而终结一切探索与探索中的痛苦,他们所神往的‘新国土’;新的人‘仍然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只有漫天‘响亮的欢歌’的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世界。”^[12]在那个大变革,大毁灭,大更生的时代,废名未盲目否定传统、断裂历史,却以唯物与辨证的态度来反思历史,审视传统,且以理论实践发掘传统文明的永恒价值,阐发古典文学的精华,这是难能可贵的。却亦造成废名与社会的主流“启蒙”、“救亡”思想的差距,且与时代文艺潮流之间也产生了审美差距,显得有些“边缘化”。但其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整理,体现出一个文学家的良心。他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不舍,在欧美风雨浸染中国文化界日渐强劲的20世纪初期,走出了独特的文化“边缘”之路。

参考文献:

- [1]冯文炳.谈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杜衡.望舒草[C]/戴望舒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 [3]周作人.怀废名[C]/文人笔下的文人.长沙:岳麓书社,1986.
- [4]沈从文.论冯文炳[C]/沫沫集.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4.
- [5]废名.废名文集·止庵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7]周作人.永日集·志摩纪念[M].长沙:岳麓书社,1987.
-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3.
- [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北京人文书店,1932.
- [10]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C]/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309-310.
- [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2]钱理群.丰富的痛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①真正的工业文明,是在平等自由等精神引导下,把人类导向繁荣。而为膨胀的私欲、种族的歧视等所控制的畸形的工业文明,则是西方资产阶级、中国买办阶级联合榨取中国农民血汗的文明,其最终结果是中国农村的极度贫困和中国农村的破产。